

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

刘保昌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人有了远渡重洋横绝四海的生活经验,海洋才真正穿透“蓬莱”迷雾,作为“真实”的“具象”,成为中国文学的观照和书写对象。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包含感时忧国、海上生活和战斗、滨海地域文化景观和意象呈现等四种主题类型。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之中寻找中西民族国民性差异的思路,是近代以来在中国思想学术界非常流行的理论模式,直到1980年代仍然在学术专著和电视政论片中老调重弹,并在受众中产生较大反响。身处中西强弱对比极其悬殊、中国饱受凌辱的时代洪流之中,论者对中西国民性的观察和论断也就难免失之偏颇,海洋在此成为救世的“乌托邦”,成为国民性批判的“高势位”的“他者”。贯穿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海洋书写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对于“复数的人”的关注和对于陆地家园的眷怀。海洋书写呈现出多元性的美学形态,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审美经验表达。

关键词:海洋书写;国民性批判;美学形态;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5)06-0144-13

鸦片战争“是封建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转折点”^[1]，“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2]。这种“联系”是被迫开启的，是在西方列强浮海而来的坚船利炮打击之下的被动反应。如同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样，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充满了深重的屈辱，饱含着牺牲的泪水。昆冈烈焰，烧不毁真正的精金美玉；多难兴邦，促成了艰难的凤凰涅槃。从此，天朝上国“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好梦破碎，轰隆的炮声将中国人民“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2]。他们“开眼看世界”，首先看到的就是蔚蓝辽阔波涛汹涌的海洋——西方列强的侵略铁舰满载弹药，正喷吐着浓浓黑烟横海跨洋而来。

文学是时代风雨的记录，是民族秘史的档案，是个体心灵感受的忠实呈现。海洋从此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古代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始终没有摆脱游仙骋思的“想象”与托物言志的“观看”这两种表现模式。“想象”与“观看”都是陆海空间隔绝的必然结果，冯友兰说过：“从孔子的时代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来没有到海上冒险的经历。”^[3]只有进入近代，中国人有了远渡重洋横绝四海的生活经历，海洋才真正穿透“蓬莱”迷雾，作为“真实”的“具象”，成为文学的观照和书写对象。

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如何体现和表达中国人关于世界地理空间的崭新认知？如何继承和超越中西海洋书写的漫长写作传统？如何建构和完成海洋书写的立体型主题结构？如何以

收稿日期:2015-07-23

作者简介:刘保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14BZW112),项目负责人:刘保昌。

海洋书写中的鲜明文化价值取向寄托“感时忧国”的人文情怀？如何在海洋书写中彰显迥异于传统的复杂美学诉求？如何在中西古今的比较视域中估衡其得失成毁？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一、海洋书写的四种主题类型

从朱琦拟乐府诗《关将军挽歌》、王韬短篇小说《因循岛》、梁启超诗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刘鹗讽刺小说《老残游记》等以迄 21 世纪的当下，海洋书写走过了 170 多年的历程。我们自然无法穷尽近代以来卷帙浩繁的所有涉及海洋书写的文本，却可以从主题选择角度大致分为四种类型。

（一）感时忧国

“感时忧国的精神”和“道义上的使命感”^[4]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典型特征，也是对“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古典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鸦片战争催生了一批拟乐府诗歌创作，如朱琦《关将军挽歌》歌颂危难关头为国捐躯的关天培，以海洋风涛渲染恢宏的战争场面，凸显史诗风格。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吊诡，在近代中国人对陆海关系发生了符合科学理性的客观地理认知转换之后，不少文学作品更愿意以“海外孤岛”或“大海孤舟”作为中国的隐喻，这至少在形式上是对先秦时代“海中地”^[5]地理认知的回归，不同的只是从先前的天下中心漂移到了世界边缘。王韬短篇小说《因循岛》描写书生项某出海遭遇风暴，漂到“去中华九万里”的“因循岛”上，岛上的文官武将刚开始时贪图小利引狼入室，到豺狼横行之际则百般巴结，甚至有官员出让自己的妾妇幼女陪寝以求荣华富贵，小说以如刀讽喻、似火愤怒象征性书写了海洋狂涛冲击下风雨飘摇的中国命运。刘鹗《老残游记》将主人公老残的游历过程隐喻为医治国家创伤的过程，富含浓郁的谴责意味。小说第一回通过老残的“危船一梦”表达治疗中国的理想，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以风高浪急中随时有沉船危险的大海孤舟来隐喻千疮百孔随时沉沦的中国：

这船虽有二十三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什么事。由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谢迪克将《老残游记》译成英文时，特别在此段文字下加上附注：“二十三丈长代表 1911 年革命前中国的二十三个行省”，而“约有三丈长的破漏，代表当时的满洲”正受“日俄窥伺”，“东边的伤痕”则是“受英、德虎视眈眈的山东”^[6]。老残和他的朋友出于道义，携带了“一个最准的向盘，一个纪限仪，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乘坐轻快的小艇前往支援，却被大船上的全体人员视为“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赶回小艇，小艇也被众人用“断桩破板”“打得粉碎”。国事螭蟾，民心堪忧，莫如此时为甚。

以海洋书写表达感时忧国情怀，还体现在海洋生态文学作品之中。张炜短篇小说《在族长与海神之间》着力描写大海对金娃的完美塑造过程：大海引导着金娃往真、善、美的境界跃升；长篇小说《刺猬歌》叙写滨海荒原莽林改造为旅游胜地的故事，强烈谴责了商业文明对原始田园文明的野蛮入侵，敬畏自然、保护环境是该小说的核心主题，其中的人兽交融、神仙传说、海神崇拜等海洋文化景观更是令人耳目一新。王彪的《大鲸上岸》、任一舟的《月光·海潮·女人》、叶宗轼的《海那边人家》以及台湾小说家黄春明的《看海的日子》、廖鸿基的《鲸生鲸世》、夏曼·蓝波安的《冷海情深》等，将海洋视为人类敬畏的对象，表达人类与海洋和谐相处的理想，也都体现出鲜明的生态意识和现代人文诉求。

(二)海上生活和战斗

1841年中英《广州和约》签订,清廷向英军赔款630万两白银,清军退驻广州城外60里。魏源闻讯写下《寰海十章》,痛斥投降派昏庸误国,语多讽刺。黄遵宪《降将军歌》刻画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悲剧人生,富有历史和人性深度,在同期海战书写中尤其具备独特的文学史意义。诗作截取甲午海战的一个片断,北洋水师被重重围困在威海刘公岛,主帅丁汝昌面临艰难的抉择:一方面,清军可以坚守此岛,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另一方面,“我军力竭势不支,零丁绝岛危乎危”,凭什么再战呢?“六千人命悬如丝,我今死战彼安归?”死战的结果必然是全军覆没。丁汝昌最后决定独自承受骂名和屈辱,“乃为生命求恩慈”,通过投降保全了六千将士的性命,自己则自杀殉国,以死明志。这首诗写出了历史人物的性格纵深度,战亦不能降亦不能的抉择的矛盾和痛苦,凸显了诗作浓郁的悲剧气氛,长风高浪的海洋环境则增强了主人公悲愤激昂的情感律动。

新中国成立后描写海洋战斗的文学作品,一般叙写解放前后渔民们在党组织领导下,采取各种形式与渔霸、海匪、阶级敌人、外国特务等进行斗争,主人公阶级立场坚定,智勇双全,慧眼如炬,虽然历经艰险,遭遇曲折,最后总能一举粉碎敌人的阴谋,取得全面胜利。由于主题先行,此类小说基本采取相同的叙事模式,在高歌猛进的凯旋中突显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很难打破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其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则往往善于描写海洋风光,刻画渔民日常生活,有长期的海洋生活经验作为叙事基础,以海洋的狂风巨浪烘托大气磅礴的战斗氛围,如陆俊超的长篇小说《幸福的港湾》及小说集《姐妹船》《国际友谊号》《相逢在安特卫普》等。他的中篇小说《九级风暴》描写新中国成立前夕,一艘名为“凯旋”号的巨型商船停靠在新加坡港口,在船长彭涛和老水手李阿海率领下,毅然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起义回国,海员们团结一心,战胜了自然界的惊涛骇浪,也击败了来自敌特方面的惊涛骇浪般的武装进攻和颠覆阴谋,胜利抵达广州。小说以粗犷雄豪的笔触、惊险动人的情节、浓郁强烈的海洋生活气息,书写了中国海员英勇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失为十七年文学中少有的成功之作。黎汝清的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以女民兵连长海霞的第一人称口吻写成,海洋书写富有地域特色,读来亲切感人。姜树茂的长篇小说《渔岛怒潮》描写1947年春天发生在胶东解放区龙王岛上的战斗生活,风光旖旎的海洋环境和细致生动的渔民生活描写,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秦牧的中篇小说《黄金海岸》描写海外华侨凄楚哀伤而又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沉郁沧桑,令人柔肠百转。杜埃《风雨太平洋》、刘少卿《霹雳山风云》、王啸平《南洋悲歌》、黑婴《漂流异国的女性》、白刃《南洋流浪汉》等描写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感人故事,人物不同,情节各异,但都以浩瀚壮阔的海洋作为叙事背景。

新时期以来描写海军和海员生活的文学作品日益增多,在主题、意蕴、思想、价值等方面显示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色彩。宗良煜《与魔鬼同航》是我国第一部反映中国船员劳务输出的长篇小说,在“海兰尼·拜尔”号上工作的十几名中国船员,因为与外国海员在工作技术、人生态度、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而被视为异类,饱受歧视和非难,但当轮船在好望角遭遇飓风狂浪的关键时刻,中国船员舍生忘死,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了船上的货物,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勇敢精神和崇高的人格风范,令外国海员折服。宗良煜的海洋小说富含现代海洋意识,善于从民族灵魂角度探讨生命的意义,有浓郁浪漫的激情与绮丽壮阔的想象,行文充满海洋般大气磅礴的力量。汪满明《海嫂》、史振中《远洋船长》、樊天胜《海峡,海峡》、张士敏《虎皮斑纹贝》、杨小云《水手之妻》等小说,描写出海的丈夫与留守陆地的妻子之间深沉曲折的爱情,海洋生活气息浓郁。陆颖墨《海军往事》《寻找我的海魂衫》等小说以小见大,书写海军战士的日常生活,明晰如画。汪应果的长篇小说《海殇》描述晚清中国在甲午海战后重建海军的艰难历程,在沈寿昌、萨镇冰、汪治东等主人公身上,表现出反抗侵略、不畏强权、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自强精神。全书气势恢宏,史诗般的构思,悲剧性的

风格,大海般的气势,是该小说的艺术特色。翟晓光的长篇小说《红海洋》描写新中国海军的发展历程,“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海军的建军史。从横渡长江的帆船,到‘护渔协同’的取胜,再到长波台的研制和信息化作战的准备,每走一步都伴随着激烈的思想交锋。其中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有生离死别、悲歌慷慨,它是军史,也是情史。……满纸都是风云雷电,满纸都是大爱至情”^[7]。

(三)滨海地域文化景观

描写海洋与陆地结合部滨海地区的渔民和海港生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海洋书写的重要内容。杨振声从小生活在山东蓬莱县水城镇,对海洋有深厚的感情,他的《渔家》描写海边渔民的苦难生活:在初春阴雨连绵的大海边,飓风刮走了屋顶,全家人又冷又饿,父亲出门四处求告也没有借到米面,母亲和女儿在寒风中补渔网,希望马上能用这张补好的渔网下海捕鱼。这是渔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称赞他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小说家。杨振声的《玉君》通过对海滨少女玉君的描写,刻画渔家姑娘的日常生活,描绘海洋风景和滨海人家风俗人情。丰富的海洋生活素材,对大海风物的了如指掌,对滨海人家感情变化的了解深刻细致,使小说真实感人。张炜《海边的雪》刻画倔强正直、豪爽热情的渔民形象,单学鹏《海湾三部曲》、叶宗轼《海边人家》、关仁山《白纸门》等叙写海滨渔村的风土人情,讲述时代变迁中滨海人家的日常生活故事,尤其对渔家女人的心态把握得细致入微。

代表我国海洋小说进入崭新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作品,当属邓刚的海洋系列小说。《迷人的海》描写两代“海碰子”与海洋之间的斗争和两代人之间的竞争性矛盾。他们都在拼命寻找罕见的六垄刺海参,老海碰子经验丰富然而固守传统,小海碰子有脚蹼、鱼枪、潜水镜等“现代化设备”,起初两人互相看不起,但小海碰子潜水遇险时却是老海碰子奋不顾身将其救起,从此二人结下了真正的友谊。小说情感饱满,尤其是“海碰子”与海洋的搏斗过程及其表现出来的顽强不屈的精神,令人热血沸腾。《迷人的海》对海底世界的描绘别开生面,让读者流连忘返:五光十色的海藻,闪着银光的丁鱼,幽蓝的海底流,迷蒙透亮的海底砂砾,奇异的海参和鲍鱼,噬血的箭鲨,霸道的狼牙鲛,美丽的海底珊瑚等,令人眼花缭乱。这些精彩生动的描写,若没有亲身感受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邓刚说:“不是我的创作水平高超,而是我还没看见有哪一个作家,能像我这样不顾死活地潜进浪涛下面拼命,并且从十几岁一直拼到三十多岁。”^[8]小说中海碰子的讨海生涯饱含作家的人生体验和情感关怀。《金色的海浪在跃动》描写渔家姑娘对爱情生活的热烈追求,澎湃着大海潮汐般的激情;《龙兵过》在狂怒的汹涌海涛中张扬人类的精神尊严;长篇小说《白海参》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海碰子的故事,对海洋性格有着深层把握;《山狼海贼》描写“文革”期间在辽东半岛一座临海的城市里四个二十多岁身怀绝技的“海碰子”的生活和友谊,他们征服海洋,与时代抗争,肝胆相照,激情满怀,而与女大学生韩靖的交往则让这些情感粗砺、生活单调的“海碰子”们内心丰富起来,体会到了人生中爱恨情仇的复杂滋味。邓刚说:“倘若有人问,你最感痛苦的事儿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我年轻时当海碰子——那苦咸的海水,那刺骨的寒流,那黑洞洞的暗礁,那轰隆隆的浪涛,使我至今还在睡梦中重复恐惧”,“倘若有人问,你最感幸福的事儿是什么?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我年轻时当海碰子——再也没有那样金黄的沙滩,再也没有那样湛蓝的天空,再也没有那样肥美的海参,再也没有那样放肆的快活。”^[9]曾经的痛苦和幸福、恐惧和快活,如此复杂地纠结在一起,与邓刚的青春时代同在,凝结成纸上风涛四起的文字。因此可以说,邓刚的小说是一部饱含血性激昂浪漫的交响诗,这种少有的大气磅礴的力量感和情感燃烧的灼热感堪称当代中国文学海洋书写的奇观。

(四)海洋意象呈现

海洋意象无疑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意象之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古今,不少作家都曾以深情的文字书写过海洋,以至于海洋意象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一种象征。“复杂而又单纯,暴躁而又平

和”^[10]的海洋，总是能够焕发诗人的热情，写出或热情奔放或情深意长的海洋诗篇。在19、20世纪之交，梁启超在远赴美国的轮船上，面对波浪滔天的太平洋，写下振聋发聩的诗篇《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太平洋的巨浪狂涛与浩瀚海云所形成的磅礴气势，显示出昂扬向上、英勇豪迈、雄健挺拔、自强不息的别样风情和精神力量。豪放雄健的海洋意象在郭沫若笔下同样风起潮涌，《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唱道：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洪涛哟！/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太平洋的伟力，海洋的毁灭和创造，正是五四时代雷霆万钧狂飙突进精神的具现。海洋意象本身是复杂的，还有其温柔多情的一面。同样是郭沫若，在《日暮的婚筵》中歌咏夕阳下大海的幽美，在《夜步十里松原》中刻画夜色中已经安眠的大海，这些诗作篇幅短小，玲珑剔透，情真意切，韵味幽深，表现了大海宁静的柔美。真正将大海人格化并善于以温婉感伤的笔致抒写大海多彩风姿的作家，当属自称为“海化的诗人”的冰心。在《繁星·春水》中那些描写大海的诗篇中，大海是温柔多情的倾听对象，是朝思暮想的情感寄托对象，弥漫着深沉执著而又热情温暖的“爱”。情感丰富而又善于节制的冰心，将大海与作为海军军官的“父亲”联系在一起：“父亲呵！/我怎样的爱你，/也怎样爱你的海”；“父亲呵！/出来坐在月明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她也将大海与母爱联系在一起，她写道：“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食指则将传统大海意象赋予现代主义特色和内涵，组诗《海洋三部曲》渴望融入海洋——大时代下的集体生活，但结果是“离开”——“不！朋友，还是远远地离开/离开这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我噙着热泪劝你/去寻找灿烂的未来。”在此，海洋又成了泯灭个性的压制性意象。

海洋意象呈现并非诗歌的专利，在其他文体中同样得到反复书写。许地山的散文《海》和小说《海世间》《海角底孤星》都将大海作为佛教人生观的象征载体，流露出悲观的执著。在郁达夫的《沉沦》中，大海的另一边就是祖国，但大海成了主人公的人生归宿。30年代最宏大的海洋叙事作品当属巴金的小说《海的梦》，讲述一个慷慨悲壮的海岛抗暴故事，杨和里娜的伟大的抗争精神，像海洋风涛一样激荡着读者的心灵。40年代，无名氏的《海艳》叙写主人公印蒂寻找生命与存在意义的过程。此后，宗良煜的长篇小说《蓝色的行走》以大海意象呈现人性的温暖和生命的底色，充满了哲理性的沉思，现代气息浓郁。王蒙的短篇小说《海的梦》描写52岁的缪可言饱经磨难后，终于落实政策，来到海滨疗养，他看到了向往一生却从未见过的大海，心如潮涌，却只呆了短短五天就毅然提前结束疗养，他只觉得“天太大。海太阔。人太老”；当他看到海滩上的一对年轻恋人的身影后，对自己的个体历史和民族的集体历史产生了理性主义的理解：“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永远不会中断。”在大海面前，他重新找回自信，想要将余生投入到生活的大海之中去，小说主人公的意识流与大海潮汐同一节奏，以海洋意象书写时代激流中的个体生命感受。

二、国民性批判与文化价值取向

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国民性批判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第二次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在这两次国民性批判热潮中，海洋都是开放进取的代名词，蓝色文明始终被认为是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而反复得到歌颂。反思和针砭国民劣根性，是世界上一切民族奋起抗争的序曲，只是这种反思和针砭不易被普通民众的虚伪、过敏的自尊心所接受。事实上，民族忧

患意识与民族自豪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列宁曾举例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判俄罗斯民族是“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许多俄罗斯人不能接受这种批评,“然而我们认为,这些话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真正的爱,这种爱使他因大俄罗斯民众缺乏革命精神而忧心忡忡。当时,这种革命精神确实还没有。现在,这种革命精神也还不多,但毕竟是有了。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造就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提供为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11]。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人类拥有“紧急避难权”,他说:“生命,作为各种目的的总和,具有与抽象法相对抗的权利……唯一必要的是现在要活,至于未来的事不是绝对,而是听诸偶然的。”^[12]“要活”才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第一权利,在精神层面展开国民性批判之前,首先必须保证国民的物质生存权利。早期国民为了求取物质生存,必须依赖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就近”从大陆、山川、草原、江河、海洋中谋取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本身并不存在优劣之判,彼此难分轩輊。

国民劣根性有多种表现形态,近代以来人们进行了各个层面的分析和研究,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从1889年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文章,认为中国积弱落后的原因在于中国国民性中缺乏独立自由意志、民族主义思想、集体主义与公共爱国精神等。随后,维新派及部分社会开明人士撰文对国民性问题展开探讨,从不同角度、立场出发,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具体方法与实践途径,体现了“国民性”话语的巨大魅力。从中不难见出论者将中西文化过于简单地“二分”处理,这种简单化的倾向到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人那里被置换为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新文化运动中的“现代性”理论将国民性视为中国传统的“能指”,“批判国民劣根性”于是上升为批判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掇物质而张灵明”的“立人”主张与实践方式,就是以“批判国民劣根性”作为理论前提;沈从文以“湘西边城世界”对照城市阉寺人格;老舍《骆驼祥子》批判国民性中冷漠的“个人主义”;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批判国民的“精神奴役创伤”,等等。

80年代的寻根小说再次掀起国民性批判的大海狂澜。他们往往将目光投向乡村,结果多为无奈与失望。在郑义、李锐、韩少功等人笔下,农民被亘古不变的土地所束缚,无法逃离也无处逃离,人不得不作为土地的奴隶而生存,活得无可奈何。老井、厚土、鸡头寨等地域已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强大到足以限制、同化、束缚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认为“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批判国人的“脏、乱、吵”和“酱缸文化”“缺乏朝气”“一盘散沙”,他开出的药方是“绝对崇洋,但不媚外”,虚心向西方学习。在上述作品中“海洋”长期缺席,“蓝色文明”也被视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千差万别,改造国民性的具体设计方案不一而足,但都有一个理论前提,那就是中国国民性落后于西方国民性,原因在于海洋与大陆的不同生存环境,最突出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对海洋的崇拜和讴歌,进而批判以黄土文明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内陆保守自闭的国民性。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大声疾呼:“吾闻海国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泼,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颺。”海国民族“高尚以活泼”的思想面貌,就是中国国民性改造和国民精神培育的方向。

向海国民族学习的前提条件当然是因其具有比较优越和先进的国民性,这种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之中寻找中西民族国民性差异的思路,是近代以来在非常流行的理论模式,直到80年代仍然在学术专著和电视政论片中老调重弹,并产生较大反响。身处中西强弱对比极其悬殊、中国饱受凌辱的时代洪流中,论者很难不被历史理性主义和现实功利主义所裹挟,对中西国民性的观察和论断难免失之偏颇,海洋成为救世的“乌托邦”。在偏见的洪流之外,壮游(金天翻)的《国民新灵魂》是少

有的立论公允、见解精辟之作。该篇以“灵魂”作为国民性和国民精神的代名词,认为近代西欧人富于勇敢探险的精神,他们“出万死不顾一生,战浩涛,战烟瘴,战土族,数十百战而后殖民之政略伟焉”,“经商遍大地,乌皮之靴及五洲”。而古代中国人也曾富于勇敢探险的精神,“神禹治水南至赤道北暨冰洋,穆满西游登昆仑而见王母,庄蹻辟滇池,而张骞、定远通西域,唐玄奘以一僧一钵至于印度,郑和下西洋而至于阿剌伯红海之岸,郑成功逐荷兰而据台湾,此非吾民族探险之证乎!”只不过中国古代的探险精神在明末以后逐渐消歇,国民灵魂一蹶不振,“今日萎靡蜷曲反成惯习,处交通之世界,而心醉老死不相往来之治,则谓无探险性质亦宜也。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天,心非不往,其如灵魂已怯薄无所用何”^[13]。近代以来的探险精神主要表现在海洋远航方面,只因为“处交通之世界”,“不相往来”的旧梦无法再做下去,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以海洋远航为载体的世界近代化潮流都已势不可挡。

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具象,是历史理性认知的形象化表达,是社会存在的直观反映;另一方面,文学的情感丰富性和意义多元性又往往会溢出文本表象的主题框囿,呈现出复杂的内涵多义性。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起始于以中西二元对立作为理论预设的国民性批判思潮,当我们回溯170多年来的海洋书写历程时,就会发现传统文化巨大而坚韧的影响力几乎无处不在。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指中国本土以想象和观看为主要特征的古代海洋书写传统,另一方面是指西方从古至今动态发展的海洋书写传统,这两种传统纵横交叉形成十字型书写结构,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海洋书写及其文化价值取向。在主题鲜明、意义明确的政论文学之外,叙事文学、抒情文学的海洋书写呈现出复杂的面相。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14] 文学的历史也是这样创造的,这种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中所呈现的文化价值取向,不仅受到中国古代海洋书写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也受到西方海洋书写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尤其是18世纪以来的西方海洋书写,其所呈现的文化价值观已是我们无法漠视的存在。

与中国古代蓬莱世界的神仙想象迥异其趣,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暴躁易怒,心胸狭小,正是对远航途中风浪突起的海洋的合理性想象。危机四伏诡谲多变的大海形象以及超自然的喜怒无常的海神想象,到荷马史诗时代依然经常得见。随着西方航海技术的日益成熟,人们对驾驭大海日益充满信心。从18世纪开始,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第一次以写实手法描写人类接受大海挑战、勇敢顽强地开拓生存家园的故事,充满了人类征服海洋的自信。但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柯勒律治《古舟子歌》中的海洋依然是神秘莫测的世界,作者仍在想象王国中驰骋才情。19世纪的海洋书写富于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大海,威严、粗犷、豪迈、有力,波浪滔天,时时卷起剧烈的风暴,“拜伦式英雄”则孤傲、狂热、浪漫,充满反抗精神。大海就是主人公的精神投射对象。人格化的大海在安徒生《海的女儿》中得到诗意化的纯净表达,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康拉德的《水仙女号上的黑鬼》《吉姆爷》《青春》等小说将海洋视为人性的实验室,歌颂人类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征服海洋的雄心,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但也反对“强力意志”对人类文明的伤害。麦尔维尔《白鲸》是海洋书写中的一曲悲歌,大海最终吞噬了一切,夺走了船员们的生命。进入20世纪,杰克·伦敦的《海狼》《白牙》《马丁·伊登》等,洋溢着充沛的阳刚之气,张扬“超人”的勇敢、意志和体魄,让人热血沸腾。但盲目“征服”容易导致虚妄,杰克·伦敦与他笔下的主人公马丁·伊登一样,最后选择了自杀,这似乎是一种人生隐喻,也是海洋书写中文化价值观念转换的开端。从此,人、海二元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念转向为人、海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念,如奥尼尔《东航卡迪夫》《天边

外》，毛姆《月亮和六便士》，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个》等，都将大海描述为世外桃源。素负盛名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塑造了一个在失败和挫折面前永不低头、从不气馁、坚忍抗争的老渔夫桑地亚哥的“硬汉形象”，张扬一种“人可以被毁灭，但却不能被打败”的坚强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老人的韧性抗争，以及在失败面前的不失尊严，对象都不是大海。老人把大海当作一个女性的朋友：“脑子里的海永远是‘海娘子’”，“老人总想着她是女性的，她可以给人很大的恩宠，也可以不给；假使她做出野蛮的恶毒的事情，那是因为她无法控制自己。月亮影响她，就像月亮影响女人一样，他想着”。

由此看来，在西方文学海洋书写的文化价值取向上，主张人类对海洋进行掠夺式开发与强势殖民开拓的作品只占很小比例，而与海洋和平相处、视大海为主体精神的投射、张扬人类勇敢坚韧顽强拼搏的精神、将大海作为人类情感和心灵的归宿、在海洋生活中不断提升自身品格完善人性等，才是西方文学海洋书写中文化价值取向的主流。但170多年来，无论是烽火连天革命救亡的年代，还是改革开放迎头赶上的年代，都不可能平心静气地接受和认同类似的文化价值取向，这就是罗杰·皮尔逊在《文化与社会》中所说的“社会距离”，“这个距离并非空间测量法，而是指个人或集团之间的隔离感，它产生于文化的不相容性”^[15]。“社会距离”决定了我们的关注重点在于“文化的不相容性”，于是人类征服、开发和掠夺海洋便成了我们“视域”中的西方海洋书写的主流文化价值，这种对西方文学海洋书写的“效果史”理解和片面化“选择性”接受，无疑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偏见。同时，以陆海地理作为区分中西文化的本质性决定因素，也受到了以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等为代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而在学术史上，“地理环境决定论”已被证明是一种自然宿命论。

贯穿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海洋书写的文化价值取向，就是对“复数的人”的关注和对陆地家园的眷怀。我们可以在中西海洋书写的比较视域中，见出近代以来中国海洋书写文化价值取向的这两个特征。

首先是“复数的人”。

我们选择学术界普遍认为最具共性的一对作品进行分析。海明威《老人与海》与邓刚《迷人的海》都是描写“硬汉性格”的成功海洋小说，同样写“硬汉”，却有单数和复数之分。《老人与海》中的桑地亚哥是一个孤独的勇士，独自与鲨鱼群展开搏斗，永不认输，耗尽全力，最终拖着作为“主体在逆境中的精神依托”与“‘勇气’的物化”^[16]的大马林鱼残骸归来，他是不能被打败的“单数”的人，是个人英雄主义神话的具象和标志。《迷人的海》中的老海碰子和小海碰子都是搏命大海的勇士，但却并不孤独，起初互相看不起，展开竞争，直到老海碰子冒着生命危险拿出全身“抢硬滩”的本领救起小海碰子，从此老海碰子和小海碰子成为患难与共、互帮互助的忘年交，一起迎战恶浪、寒流、箭鲨、狼牙鳢，老海碰子“从心眼里喜爱这个莽撞而勇敢的小东西，无论多么可怕的打击，只要一过去，就毫不在乎，精神百倍。他相信小海碰子到了他的岁数，将会比他更老练，更有本领”。小说结尾写道：“迎着冉冉升腾的红日，一老一少两个海碰子又并肩扎进了浪涛滚滚的大海。”在书写悲壮的海碰子生活时，洋溢着昂然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散发出迷人的人道主义光辉。这种对“复数的人”的关注，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精神的形象表达。在邓刚《白海参》《山狼海贼》，宗良煜《与魔鬼同航》，樊天胜《海峡，海峡》，汪应果《海殇》，翟晓光《红海洋》等小说中，塑造的依然是“复数”的人物群像。在人物性格的深度挖掘与表现方面，很少能够达到桑地亚哥那样孤绝的高峰。

其次是对陆地家园的深情眷怀。

西方文学的海洋书写很少眷怀陆地家园，视海洋为冒险家追求财富的乐土，海船就是他们的家园。在麦尔维尔《白鲸》、康拉德《水仙花号上的黑鬼》、杰克·伦敦《海狼》等小说中，大海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被视为人类心灵的归宿，很少有对海岸的情感怀念与对家园的不倦瞻望。但中国

文学的海洋书写却呈现出明显的陆地家园情结,如汪满明《海嫂》、史振中《远洋船长》、樊天胜《海峡,海峡》、张士敏《虎皮斑纹贝》、杨小云《水手之妻》等小说,出海的丈夫与留守陆地的妻子之间,情感联系密切而深沉。描写滨海地域生活的文学作品,一般都能很好地处理海、岸关系。同样写海燕,高尔基的《海燕》突显海燕战天斗海的矫健英姿,文笔粗犷,气势豪迈,色彩浓郁,情感激越,给人强烈的艺术震撼力;郑振铎《海燕》抒写的却是思乡的惆怅:“如今,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托身于浮宅之上,奔驰于万顷海涛之间,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见了它们,游子们能不引起了,至少是轻烟似的,一缕两缕的乡愁么?”由眼前空阔的海洋产生思乡恋乡的情感,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海洋书写的常见手法。闻一多留美途中的诗作《孤雁》《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都是在横渡太平洋的航船上抒发思念故乡之情;杨朔的散文《雪浪花》曲终奏雅:“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人民的江山”就是海岸上的家园。舒婷的诗作《双桅船》也以“船”和“岸”的意象表达恋爱双方的自我独立性。对陆地家园的眷怀,是近代以来海洋书写的另一种鲜明的文化价值取向。这虽然容易被主张全面开发海洋、积极从事海洋争霸的人批评为深固难徙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大陆本位主义,但毕竟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史事实,评价其得失成毁还需要有“大知观于远近”的智慧。

三、多元的美学表现形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呈现出复杂的美学交融态势。一方面,中国古代海洋书写的审美传统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消失,反而经过沉淀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即使是神仙想象的写作传统,也在科幻题材、梦幻题材、儿童文学题材的近代海洋书写中得到继承和发扬;更不用说观看型的写作传统,如李白《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等等,至今仍是众口相传的名句。另一方面,随着近代以来西方海洋文学作品大规模翻译进入中国,从古希腊海洋神话、荷马史诗一直到21世纪西方海洋文学创作,都在中国作家的观照和接受视野之内。亨廷顿的“冲击——反应”分析模式也适用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在面临西方海洋书写的强劲冲击时,本土海洋写作会受到较大影响而产生“影响的焦虑”。在接受影响的同时,也会在既有本土传统中寻找相关资源予以支撑,由此产生了“审美的和谐”^[17],实现了多种美学传统的回归。

最为突出的美学呈现,是文学作品中出现了恢宏壮阔的写实性海洋景观。郭沫若《浴海》描写诗人在烈日下的海洋中“戏弄波涛”的欢乐:“太阳当顶了!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声中戏弄波涛!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我的心和日火同烧。”海洋、太阳这两个雄性的意象,成为诗人表达激烈豪迈情感的最好载体。邓刚《迷人的海》描写海底危险而壮观的世界,形象生动,绘声绘色,在中国海洋写作史上前所未见,即使置身于世界海洋文学史中也堪称卓异,这是中国海洋书写的独特贡献。力的人物,力的画面,力的故事,力的主题,力量就是大海和“海碰子”们最为典型的特征。“海碰子”这一人物群体形象甚至这个称谓,都已成为邓刚小说的独特符号,也是中国当代海洋书写的独创性符号。

在恢宏壮阔的海洋景观之外,还有对恋人们海洋巨浪般汹涌情爱的描写。在无名氏的《海艳》中,男女主人公印蒂和瞿紫在夜海中相遇相知相爱,在大海的涛声中,他们感觉到“生命今后再不是许多碎片的缀合”,“而是一片浩瀚整体”。生命就像海洋一般浩瀚,充满活力。他们以大海般的激

情相爱，享受着自由和生命的大境界的美。小说描写恋人眼中月下的大海：

月亮从海平面升起，像一株银色火，又冷静，又精炼。海上立刻釉了层蛊惑色彩，引诱人投向她……白色睡莲花，无数千万朵，恍恍惚惚，梦样展在海上。月光把海造成一座白色花苑，一个花式的海。适应海面水分子圆运动、椭圆运动和水平运动，这一片白色作圆舞蹈，拍着缓静的节奏。对照海上这片玉白，天上一片深蓝，蓝中又一片透明：是星斗。天和海似乎本是一个存在体，一个无穷无限的巨大蛤蚧，忽然张开来，上面蓝，下面银。在蓝和银的界限内，轻驰着亚热带海风，像麋鹿，敏捷而温柔，带点咸味。

海天一色，动静相宜，如梦似幻，声色俱全，在这里，大海成为情爱的象征，癫狂炙热，如醉如痴。

描写梦幻般的海洋是徐訏的特长。《阿拉伯海的女神》中“我”在阿拉伯海游船上与一位阿拉伯女巫谈论人生经历，与阿拉伯海女神奇遇，而后与女巫的女儿产生恋情。最后，被世俗和宗教所反对的一对恋人跃入大海，以死殉情。“哪儿有巫女？哪儿有海神？哪儿有少女？”原来是“我一个人在地中海里做梦”。如梦似幻的氛围，异国情调的铺陈，哲学沉思的气息，如痴如狂的爱恋，与海洋背景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再现了海洋梦幻书写的奇观。其《荒谬的英法海峡》也写大海一梦，黄粱梦醒，“我”忍不住感叹一声：“真是荒谬的英法海峡！”小说借写梦境来批判现实，寓意明晰，而文本中的海洋书写却有极其浓郁的梦幻色彩，引人入胜。

海洋书写多元美学形态的另外一个显著表现，是书写大海清丽平和的美。同样是郭沫若，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曾疾声高呼过“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岸上》却是浅唱低吟：

岸上的微风/早已这么清和！/远远的海天之交，/只剩下晚红一线。/海水渊青，/沉默着断绝声哗。/……一轮皓月儿/早在那天心孤照。/我吹着支/小小的哈牟尼笛，/坐在这海岸边的破船板上。/一种寥寂的幽音/好像要充满那莹洁的寰空。/我的身心/好像是——融化着在。

庐隐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以细腻纤微的抒情笔致，感伤哀怨的自叙风格，讲述五四时期女青年露莎和她的同窗好友玲玉、莲裳、云青、宗莹等人从追求到幻灭的心灵历程，大海成为主人公的感情映射对象：“她们在屋前屋后徘徊了半天，直到海上云雾罩满，天空星光闪烁，才洒泪而归。临去的一霎，云青兀自叹道：‘海滨故人！也不知何时才赋归来呵！’”杨振声的《玉君》描写林一存送别周玉君后，主人公满怀离愁别绪，他“一个人坐在小舟上，左右漂流，不知何处归去。举目四顾，海阔天空，只远远地望到一个失群的雁，在天边逐着孤云而飞”。“失群的雁”“逐着孤云飞”，这种意象是对古典诗词传统的继承，如杜甫《孤雁》“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以情写景，情景交融，是“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多情唯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的传统诗学路径。在相同的抒情路径上，海洋意象呈现出婉约的风情，成为主体情感的载体。余光中的《乡愁》也是以情写景的经典，“海峡”作为“乡愁”的最后一个意象出现：“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进入近代以来，海洋逐渐成为中国作家的现实生活场景。据1934年顾凤城编撰的《中外文学家辞典》统计，现代中国作家217名，其中89人有留学背景（留日39人、留美12人、留欧34人、其他4人）。这批作家都有出洋经历，有的还不止一两次，长达十天甚至月余的航海生活很自然地成为作家的创作素材和叙事背景。钱钟书《围城》开篇描写方鸿渐与鲍小姐逢场作戏的情事，就发生在印度洋上。作为叙事背景或生活场景出现的海洋书写，具有日常生活美学的叙事特征，此类书写更多地存留于作家们的航海日记中，并在其后的创作中焕发光芒，其意义在与传统海洋书写的比照中会更突显。

在充满张力的美学呈现中，我们不能忽视海洋意象写作的独特美学意义。海洋意象的喻体从

空间到时间,再到人民和力量,甚至是存在本身的广大无边与无穷的力量,都已成为其共性特征。王富仁认为,郭沫若《女神》以大海般的整体力量与结构,开拓了迥异于中国几千年传统诗歌审美境界的崭新天地:

在郭沫若所面对的大海里,一切都不是作为特写的符号存在的……它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没有思想含义的形式,是一种没有本质的现象,它需要的不是领悟、咀嚼和品咂,它需要的是感受,直接的感受;它不需要你联想什么,不需要你赋予它什么意义,只需要你的心弦随着它的波涛起伏,应着它咆哮跳动……它给你的仅仅是那一刹那的沉醉,但正是这一刹那的沉醉使你感到你自己是完全自由的,是充满巨大、澎湃的生命力的,感到你不是卑微的、软弱的、草芥般微不足道的,而是一个高扬的人,是世界的主宰,宇宙的主人。^[18]

可见海洋意象于此居功甚伟。徐志摩《地中海》抒发思古之幽情,也歌咏了“这孤零零地神秘伟大的地中海”:

无数的帝王、英雄、诗人、僧侣、寇盗、商贾,曾经在你怀抱中得意,失态,灭亡;/无数的财货、牲畜、人命、舰队、商船、渔艇,曾经沉入你的无底的渊壑;/无数的朝彩晚霞,星光月色,血腥,血糜,曾经浸染涂糝你的面庞;/无数的风涛、雷电、炮声、潜艇,曾经扰你乱平安的居处。

历史来,历史去:/埃及、波斯、希腊、马其顿、罗马、西班牙——/至多也不过抵你一缕浪花的涨歌,一茎春花的开落!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篇末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9]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预言共产主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20]686},“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20]709}。海洋意象无疑增添了毛泽东文章的大海巨涛般的磅礴气势。胡风《时间开始了》歌颂道:“海/沸腾着/它涌着一个最高峰/毛泽东/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好像他微微俯着身躯/好像他右手握紧着拳头/放在前面/好像他双脚踩着一个/巨大的无形的舵盘/好像他在凝视着流到了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大小河流。”这是以海洋比喻人民。郭小川《致大海》:“我要像海燕那样/吸取你身上的乳汁/去哺养那比海更深广的苍穹/我要像朝霞那样/去你的怀抱中沐浴/而又以自己的血液/把海水染得通红。”这是以海洋比喻革命群体。

绿原《又一名哥伦布》将自己想象成五百年前那个远航成功的哥伦布,“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人民,甚至/告别了人类”,不同的却是哥伦布能够征服海洋,而诗人“这个哥伦布形销骨立/蓬首垢面/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漂流在时间的海洋上/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坚信前面就是‘印度’——/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地”,意境苍凉,充满信念的力量,这是以海洋比喻时间。舒婷《致大海》:“大海——变幻的生活,/生活——汹涌的海洋。/……这个世界/有沉沦的痛苦,/也有苏醒的欢欣。”这是以海洋比喻生活。陈敬容《山和海》:“无形的海呵/它没有边岸/无论清晨或黄昏/一样的深,一样的蓝//一样的海呵/一样的山/你有你的孤傲/我有我的深蓝。”这是以海洋比喻人格,诗人更愿意做那深蓝的大海,充满活力,波涛汹涌,永含激情。进入新时期后,出现了一些消解海洋崇高性、庄严性和永恒性的诗作,如韩东《你见过大海》:“你见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然后见到它/就是这样/你见过了大海/并想象过它/可你不是/一个水手/就是这样/你想象过大海/你见过大海/也许你还喜欢大海/顶多是这样/你见过大海/你也想象过大海/你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就是这样/人人都这样。”没有惊奇,没有崇拜,在有些饶舌的大白话中,显示出诗人对于大海“不过就是这样”的情感冷漠,也是对过往宏大叙事的解构,对全民性的政治思想“运动”的嘲讽,颇具后现代主义诗学的特征。

四、余 论

170 多年来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不断吸取中西海洋文学创作的传统艺术养分,加以综合性的融会贯通,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一批鲜明生动饱含艺术感染力的人物艺术形象,在多个主题类型中进行较深入的海洋书写,表达出符合民族传统精神的文化价值取向,在艺术层面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美学形态。一部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近代化转型的历史,就是近代以来民族精神成长的再现和文化认知进步的形象史。

在中西古今的比较视域中展开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完全没有必要在西方海洋文学面前妄自菲薄,文明类型的差异本身并不代表文明水平的高低和文明禀赋的优劣。正如有学者所说,在西方海神波塞冬身上,可以看到西方海洋文化的冒险、征服、掠夺、欺诈、霸权的特征;而在中国海神妈祖信仰上,人们看到的却是和平、自由、平等、共存的文化精神^[21]。同样,在中西海洋书写比照中,普遍认为“在西方的海洋文学经典中,海洋是扩张势力的途径,也是被征服的对象,小说的主人翁往往在历经海洋的大风大浪,以及海洋生物的强大韧性后,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也证实了自己的存在,进而完成自我价值的定位,充分展现他们冒险犯难的民族性格”,而中国的海洋文学,“要么视海洋为敬畏的对象”,“要么展现人类与海洋和谐亲密相处的一面”,“这种差异缘于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颇为不同的广适性和容异性特征上”^[22]。将西方海洋文学经典局限于掠夺主题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的结果。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将文明类型的差异性作为估衡文明水平高低、文明价值优劣的标准。

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方面,也存在着相似的西方价值取向。如有学者认为:“20 世纪末叶以来,人们的‘世纪末’感觉与心态日益加重:人类的人口越来越大、环境越来越恶化、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陆地资源越来越减少、食品生产和供应越来越捉襟见肘……21 世纪怎么办?难道人类只能在 21 世纪束手待毙?人们这才把目光重新投向海洋: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70% 多的区域是海洋!那里是一座天然的浩大的可供我们人类无量(尽管有量)宝库!我们人类的祖先诞生于海洋、发展于海洋,我们有必要‘重返海洋’。”^[23]在陈思和看来,“一切出于大国利益争夺而推动起来的所谓‘海洋世纪’,无非是人类已经把陆地上的一切自然资源掠夺、摧残殆尽,开始将贪婪的目光转向海洋资源的一个悲壮信号”,“回到几个世纪以前,这样的贪婪与霸道心理直接孕育了西方殖民主义这一怪胎,它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可耻的西方向东方殖民地掠夺的血腥历史。现在地球上的土地、森林、河流、荒野几乎被所谓的发展‘文明’破坏光了,21 世纪来临,所有地球上的人类(我们)一起朝海洋进军了。大海无言,鲸鱼不会掀起反人类殖民海洋的运动,但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还不令人心悚骨立么?”^[24]这才是人文学者应具的清醒的理性认知立场。近代以来的中国曾经饱受列强凌辱,有过漫长的刻骨铭心的被奴役的惨痛记忆,至今仍然挥之不去,但这并不是我们认同和追随列强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的理由,更何况西方文学的海洋书写在 20 世纪已经出现明显转向,能够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海洋伦理正在形成,一系列的海洋国际法正在实施,中国文学海洋书写中所表现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当此之时,我们当然没有必要片面捡拾 19 世纪西方文学征服、掠夺海洋主题的余唾,没有必要将其奉为指导当下海洋文学创作实践的圭臬、批判人与大海和谐相处主题的法宝。

我国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有 18 000 公里的海岸线,有 300 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其中有部分海域与外国存在争议。近年来,一系列海洋争端引起民众对于大海的关注。百年中国走过了曲折的海洋发展道路: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系统提出过经略海洋的伟大构想,即积极对外开放,向海洋求生存、求发展,加强港口建设,联系内陆铁路、水运、公路等水陆交通,通过外通内联

带动国家整体实业发展。毛泽东提出建设“海上长城”和“海上铁路”的海洋战略思想。“海上长城”是国家权益表现在海洋上的“利益边疆”；“海上铁路”是要组建强大的海上运输和保卫等综合力量。邓小平提出“近海防御”的海洋战略，是包括长期防御、积极防御、区域防御和纵深防御的四位一体的防御体系，以“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处理海洋争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坚持陆海统筹，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力主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合作，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揭开了中国海洋发展的新篇章。近代以来，我们誓死抵抗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我们现在不会、将来强大以后也不会侵略别的国家，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形态，文学始终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镜”或者照亮时代前行的“灯”。伴随着新世纪中国特色海洋发展道路的伟大实践，一定会产生一批在主题选择、人物形象、思想内涵、价值取向等方面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海洋文学作品，这是可以预期的。

参考文献：

- [1] 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5.
- [2] 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1.
- [3]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9.
- [4] 夏志清. 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M]//中国现代小说史.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57.
- [5] 张正明. 地中海与“海中地”——就早期文明中心答客问[J]. 江汉论坛,1988(3):42-46.
- [6] Harold Shadick, tr. The Travels of Lao Ts'an[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2: 238-239.
- [7] 谢冕. 故事来自大海洋(代序)[M]//翟晓光. 红海洋.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2.
- [8] 邓刚. 继续与初生牛犊斗嘴 38 回合[J]. 文学自由谈,2009(4):46-54.
- [9] 邓刚. 我曾经是山狼海贼(后记)[M]//山狼海贼.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315.
- [10] 覃子豪. 题记[M]//海洋诗抄. 香港:香港文艺风出版社,1987:55.
- [11] 列宁.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M]//列宁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0.
- [12]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30.
- [13] 壮游(金天翻). 国民新灵魂[J]. 江苏,1903(5).
- [14]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
- [15] 罗杰·皮尔逊. 文化与社会[G]//冯利,覃广光,编. 当代国外文化学研究.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126.
- [16] 张菊,宁一中. “陌生化”的英雄叙事:《书店》和《老人与海》的互文阅读[J]. 外国语文,2013(3):17-21.
- [17] 席勒. 审美教育书简[M]. 冯至,范大灿,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7-28.
- [18] 王富仁. 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J]. 郭沫若研究,1989(7):2-13.
- [19] 毛泽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M]//毛泽东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
- [20]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1] 徐晓望. 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406.
- [22] 朱双一. 中国海洋文化视野中的台湾海洋文学[J]. 台湾研究集刊,2007(4):86-94.
- [23] 曲金良. 海洋文化概论[M]. 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3.
- [24] 陈思和. 试论 90 年代台湾文学中的海洋题材创作[J]. 学术月刊,2000(11):91-98.